

# 基于资本现实合理性对 实现“共富”的思考

邱卫东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市 200237)

**摘 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进行财富生产的基本现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却使得我们必须共富征程中直面“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之内在紧张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在资本批判的高度上,本质地澄明当代中国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即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有效引导驾驭资本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健全与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的分配机制是达致“共富”的核心指向,以此,才能全面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之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资本批判;剩余劳动;消灭剥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B032/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25-09

## 一、“共富”何以读写? 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sup>[1]14-15</sup>。历史地看,这一曾经糅杂着传统记忆与未来理想的“共富”追求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那段“懵懵懂懂”、“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sup>[2]117</sup>的特殊历程并遭遇了社会主义财富运动过程中的“最大波折”<sup>[3]298,333</sup>后,终于在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根本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逐步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焕发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之修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客观上意味着资本力量(包括不断引进的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以及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与改制后而来的国有资本等等)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事实上,随着资本力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直接支配包括劳动、管理、技术、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其也“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力量”<sup>[4]2</sup>。如此历史境遇,使得我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得益于资本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过程中的巨大优势而经历了GDP总量快速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

\* 收稿日期:2013-08-22

作者简介:邱卫东,法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道路研究——基于资本批判视角的考察”(2013EKS001),项目负责人:邱卫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财富观的演进历程研究”(W01223002),项目负责人:邱卫东。

活水平得到更进一步提高、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舞台更为深入等伟大业绩的同时,也同样因为整个社会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sup>[5]456</sup>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叠加,产生了诸多在《资本论》中就被马克思揭示出的矛盾悖论,而贫困和富有就是其中之一。从国际银行测算且被学界多数认可的基尼系数看,中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已经逼近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红线”。

显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间的矛盾悖论,使得我们必须在资本批判的历史高度上,全面系统地就当下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深入反思。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下述几大核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一,如何科学地评判资本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中的历史地位?第二,因应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资本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而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一条可以引导资本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的有效路径?第三,也是社会舆论最为聚焦的,就是如何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一套既与当下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同时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契合的财富分配体系?有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面深刻地把握自己当下所追求的“共富”之应有历史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推向深入。

## 二、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清晰地告诉我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6]67</sup>。因此在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全程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逻辑设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6]78-79</sup>事实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财富,构成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特有指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使用财富的历史。当然,基于财富与人之本质的内在关联以及人之本质的自由指向,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知到,那种“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肯定“不是我的生命”<sup>[7]38</sup>的本质。因为这种生产劳动追求的目的还只是停留在作为生物物种的层面上,只有超越生存需要的“自由的劳动”,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马克思为此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生产自由的劳动的价值所在:“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sup>[7]38</sup>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清晰地界定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要想得到真正发展,人的自由程度要想得到真正提高,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够寻找到一种能在本质上作为剩余劳动的社会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有效机制。

而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坐标体系中我们发现,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尽管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传统中国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取得了曾有的辉煌成果,其所拥有的作为财富重要表现的金银货币总量甚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均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之上,但若从财富哲学的层面上来审视这个传统社会,我们却发现在这一整体上处于“重义轻利”氛围裹挟下的传统社会中,其中人们的那种诸如早在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就被揭示出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朴素逐利行为和动机,却在“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sup>[8]12</sup>的整体格局中被那种对社会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的过分强调所取代,而本该作为财富发展之质料因和动力因存在的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哪怕是以分散的、孤立的、偶然的、碎片化的面目出现——却因自身总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了无光彩。作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一格局使得整个社会明显缺乏一种可以激发其中的社会个体去发现、制造、占有财富的内在动力,并因此也使自己失去

了在财富实践中获得质向提升的诸多可能性,以至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历史首创精神以及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周期律”和“循环律”的绵延更替成了这个社会的外显特征。这也使得黑格尔在审视这个民族时,不禁发出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sup>[9]110</sup>的感慨。

但反观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等现代性浪潮的强力推动下,直接使得人类朴素的逐利动机开始通过人类理性的运用、通过与作为交换价值之中介的货币的内在勾连,最终在作为“资本的最初解释者”<sup>[10]181</sup>的重商主义者——即通过那种体现为“人格化资本”,并在一开始从表现为社会寄生并且往往是以零散的高利贷者或商人等资本的人格化面目出现,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从M到M')来追逐高额利润——那里,开始摆脱了本质上同样是以强调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而忽视乃至泯灭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为特征的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樊篱,进而在将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翻转为用有利于世俗逐利的原则来规范、定义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使整个社会的逐利行为和动机在与“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以及围绕资本运作生成的诸如以市场、契约、产权、信用、交换、敬业、创新、效率、精算、自由、平等、法治等为核心要素的资本文明中,获得了制度化的范式转换与理性化的工具支撑。而由此开启的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征程,在随后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进而金融资本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使得如康德所言的那种原本存在于人道之中的贪婪、占有欲等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在沉睡中被深层次地激发了出来,也使得人类社会因为在发现、制造、占有财富方面探寻到了一条史无前例的体制机制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6]277</sup>,因而也是人类财富发展“新时代”<sup>[10]198</sup>来临的重要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关于财富生产和发展之有效举措的向度而言,人们就是“至今也还没有发明一套能够完全代替资本的机制”<sup>[11]</sup>。

可以说,资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经昭然若揭,但就“共富”而言,也许只讲到这点就要我们将认知统一到“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上来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在我们的既有认知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既然要走向并实现“共富”,那就必须要“消灭剥削”,而作为“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以及“在私有制背景下内在的那种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直接造成的‘人与人相异化’”<sup>[12]59</sup>的异化因,却已经“天然”地将自己与“剥削”画上了等号。于是乎,在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中,“消灭剥削”就是要消灭资本,否则“共富”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在那个极“左”年代出现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由此比照当今中国而言,鉴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及包括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以及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等各种带有非公性质的资本力量“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若从既有的认知逻辑出发,势必要求我们在实现“共富”的进程中消灭各种非公资本,否则,“共富”将徒有其名。显然,针对这一与社会现实间存在巨大反差的“共富”解读,势必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消灭剥削”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可以说,这也是深入探究多种所有制资本存在境遇下“共富”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时必须完成的前提性任务。

事实上,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从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再到《资本论》三卷的思路探寻下去就会发现,毕其一生探究资本内在奥秘的马克思在根本上谴责的,并不是这种如 $(1+V)^n$ 那样几何数般地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上给整个社会财富带来了巨量增长并促使整个社会文明得到巨大提升的资本力量,甚至客观地说,就对资本促使整个社会文明(财富发展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论述和赞誉而言,至今为止,也没有哪个思想家可以超越马克思那般的深刻和宏伟;而马克思所要谴责并试图超越的,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介所形成的那种导致劳资间冲突对立的异化关系:即资本家在以资本为中介占有了由劳动者

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使这些剩余价值继续转化为资本来实现自身增值的同时,还使这些剩余价值不但永不复归于劳动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反而进一步使其成为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视野下给予这个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形态以充分赞誉的同时,进一步试图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sup>[12]81</sup>探索如何“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sup>[13]390-391</sup>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在有效复归于人的过程中实现向更高形态的人类社会迈进的根本原因。而如果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关于“剥削”的界定与“消灭剥削”的解决真如我们既有的认知那么简单,那么《资本论》写到“剩余价值的占有”一章时便完全可以打住,其后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剩余价值如何转变为资本、资本的扩张又是如何引起了一系列矛盾悖论等问题的论述探讨则纯属多余。

因此,我们必须从既有的“消灭剥削”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着眼于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资本运作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运行全过程来理解什么是“剥削”,而不是简单地把“占有剩余价值”这个行为片段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抽引出来,并孤立地将其作为“剥削”的基本依据,进而通过消灭作为“占有剩余价值”之内在依据的“资本”力量来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否则,如果我们在当下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无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节律以及本国财富生产发展所处的时空事实,一味地注重在道德至高点上过度贬低资本的历史地位,且以小生产时代背景下生成那种单向度的、直观感受性的“谁劳归谁得”的思维去替代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劳资界限日趋模糊的现实,进而采取那种一次性地没收资本所有者的一切财产,进而消灭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劳动价值的分割、消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从而达到让劳动者可以“真正”直接地占有自己全部劳动价值的举措,那么,这种“消灭剥削”的方式一旦实施,整个社会必将会因其阻断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方式、进而切断了社会剩余价值集中起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领域的有效动力机制,而会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处于效率低下乃至停滞的状态,甚至再度会使我们在“共富”旗号下陷入那种本质上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的、因而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要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状态的倒退”<sup>[12]79-80</sup>的尴尬境地。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在当下追求“共富”的过程中,决不能因为害怕由资本扩张而来的各种冲突悖论断然拒绝资本;相反,基于资本批判而来的历史认知告诉我们,“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sup>[14]80</sup>,因此,越是搞市场经济,就越是要利用资本力量,就越是要为各种关涉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各种所有制之间、各种产权主体之间的顺畅流通提供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对在其中依法从事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生产主体都给予法律地位上的承认和政治地位上的认可。以此,来为整个社会的财富丰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三、有效引导驾驭资本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

可以说,上述对资本在现代财富生产与发展过程中之巨大历史作用的揭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直接影响“共富”实现的那种劳资异化关系的揭示,使我们在涤清了当下与理解“共富”有着本质关联的“消灭剥削”之应有内涵的同时,同样也在实践中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面对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多种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我们如何循着“消灭剥削”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在整个战略层面上探寻出一条既与当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同时又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之根本缺陷的制度安排,从而在有效引导驾驭资本的过程中,将整个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导入到一条能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的实践轨道上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将作为促使现代财富发展之核心机制的资本力量最大限度地从曾有的那种因奴役支配劳动者而造成劳资对立、两极分化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并使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服务的重要力量。

当然,要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体范围内来进行这项工作,必将意味着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创新型探索。因为从既有的认知实践来看,一方面,由于受限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始终生活在资本主义实体范围内的马克思在逻辑推论层面上得出的未来社会的应有形态,显然不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由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范本;而有幸在实体层面上第一个触及社会主义的列宁,虽然在经历了一番曲折探索后开始真正迈向了通过认识资本、理解资本、利用资本和发展资本来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旅<sup>[21]</sup>,但那颗“罪恶的子弹”却没有留给列宁太多的时间通过诸如实行“新经济政策”之类的举措实现在“各方面把马克思创立的这门科学推向前进”<sup>[16]274</sup>的心愿;再加之之后包括前苏联、东欧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曾有的那种通过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政府行政权力来代替市场和资本力量将全社会的剩余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以此避免资本对工人的剥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富”目标,但结果却使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以至“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sup>[17]203</sup>的那段财富实践,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之前,就如何引导利用资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富”目标而言,我们除了在从曲折经历中积累的一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sup>[1]10-11</sup>外,在富有建设性的那度上仍然是非常虚弱的。正因为如此,如何在当下资本文明的总体境遇中深入探索有效引导驾驭资本进而实现“共富”目标的有效路径,也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始终坚持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回答的时代主题。<sup>①</sup>

事实上,如若在资本批判的高度上审视之前在财富实践中遭遇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我们发现在财富实践中过度强调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实现“共富”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却相应地忽视了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与本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深入探索,是造成我们以往在财富实践中遭遇巨大挫折的根本原因。

不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生产资料的产权制度不但决定着该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而且还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这其中,所有权又是生产资料的各种产权(如转让权、租赁权、收益权等等)的根据和基础。因此,社会生产过程中它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sup>[18]195</sup>。但若我们认为这一规律一经掌握就可以单纯地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我们的共富理想,甚至将其翻转为那种认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好就光荣之类的物性化思维,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在自己当下所必须经历的商品经济形态这一“自然的发展阶段”上,直面多种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在全面分析进而把握现代化大生产背景下各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运行机理——即原本在理论上可以清晰界定利益边界的各种产权要素在进入现实生产过程中后,因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各种盘根错节、密切交织的复杂关系,而在实质上造成了各种资源要素的产权边界并非就是其真实的利益边界;特别是某些关键部门的资源(如金融、电力、石油、通信等战略资源),由于对于全社会其他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作用,因而这些部门的产权拥有者就并不仅仅靠自己直接拥有产权的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而且会通过这些产权来控制全社会其他产权绑架公众利益,进而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利益扩张的目的。因此,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各种资源要素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它在事实上蕴涵的是这样一条基本逻辑,即形成资源要素所有权、进入市场经济交易、依据自身在社会经济流程中的地位来分割价值),积极探索出一条能使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公共权

---

① 关于我们为什么不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共富目标,笔者已通过对其资本主义社会之内含的“资本异化因”、“发展理念因”、“哲学教条因”的批判揭示了其所外在那种“财富和谐”的幻象本质,在此不作赘述。参见拙作:《从幻象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哲学批判》,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7期长文转载。

力监督制约下运作,从而能使整个社会创造的剩余劳动能最大限度向最广大人民复归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当然,如此必将意味着,“共富”的实现对我们来说已绝对不是那种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一个通过不断消灭现存不合理状况的现实运动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看到了这一点。在驳斥了以往那种认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sup>[19]313</sup>的物性化思维后,正式在自己的“先富”逻辑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是片面地限制收入、消极地截长补短或劫富济贫,而是一个先富带后富的历史过程,并通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进而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整个社会在达致“共富”的征程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通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sup>[1]20-21</sup>等有效举措,最大限度地实现将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引导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从而真正在实践层面上开启了资本与“共富”的内在贯通之路。

笔者认为,在上述既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sup>[5]456</sup>是产生当前各种矛盾根源的总体定位,未来中国在探索能使整个社会财富有效向广大人民复归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过程中,可以朝着下述几大方向迈进,即:第一,在产权不易明确的公有资源领域,必须实行公有制下的有偿使用制。所谓产权不易明确的公有资源,就是如大江大河、空气、太空乃至气候等这些名义上可以实行公有,但是实施过程中很难排除私人和社会集团对它们的任意使用,因而是产权不容易明晰的资源。对此,必须实行“公有制下的有偿使用制”,从而改变以往无序、低效利用以及名为公有实为个别私人占有的局面,真正将这些社会公共资源纳入到社会监管体系并通过有偿使用机制能够最终形成有利于资源有效循环使用,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格局。第二,对支配性部门的资源(如金融、电力、石油等战略资源),因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则积极探索实行公有制资本的绝对控股下的股份制,用国有资本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着力巩固公有制主体控制地位,从而在有效防止这些要素资源被私人资本所掌控而形成绑架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同时,将这些资源所带来的社会效益通过有效途径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第三,对于非支配性部门的资源(指的是那些不能支配其他资源,只能通过自身的使用来进行营利的资源,例如各种日用品生产部门、生活服务部门、农产品加工部门的生产资料等等),则应当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包括私有制),使其在公有资产的监管下有序运行。第四,对于那些创新性风险性领域,考虑到这既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与活力,同时也因各种不确定性而带有巨大的投资风险因而是任何独立资本所难以承担的事实,则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分摊风险与收益的混合所有制。以此符合现代生产力系统具有不断创新的动态特征,并同时满足尝试各种扩张需求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需求。<sup>[20]</sup>

当然,要使这种统分结合、层次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得以有效运行,其条件是非常苛刻的。笔者认为,其核心关键,乃是要使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所谓真正的公有制,就是要使公有制下的资源的使用与运行必须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根本目的,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有一套机制,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形成代表这种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有效地激励与监督公有制资源的管理者们服从这种公共意志,有效地纠正公有制企业在执行公共意志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就直接涉及与这一财富发展形态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sup>[14]22</sup>——如何更好地体现的问题。此外,在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资源的公共监管的同时,保持公有制企业的竞争活力也是摆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现实问题,这其中如何使我们的公有制企业积极有效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使我们建立起能够有效检验并考核其中的个人在为社会公共利益上所作出的贡献并建立其与之对应的薪酬管理机制,将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 四、健全财富分配机制是达致“共富”的核心指向

无论是毫不动摇地利用资本手段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还是建立与本国国情和现代生产力要求相匹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将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从而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宏伟目标。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人民”已经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抽象概念,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两个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消解,并逐渐为走向独立成熟的各财富创造和发展主体以及他们内在的多元利益取向和不同利益诉求所取代。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对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民”概念作出细分,明确其具体所指,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财富分配格局。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在探索本质上作为“生产的产物”且其“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sup>[18]36</sup>的分配方式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顺应当下财富生产结构并在其中探索如何使其中的人们能够各取所得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当下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践行将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复归于广大人民这一核心理念时所应具备的基本认知。

那么,这种在本质上作为“共富”核心指向的“各取所得”的财富分配格局到底该如何构建呢?

我们首先可以断定的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已决不是可以运用行政手段(肯定是重要手段)通过转移支付将财富分配给社会每个个人手中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身处如此生动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单靠政府这有形的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达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显然会因信息不对称、运行成本过高以及制约民众的积极性等多种弊端而难以维系,因此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系统本身要有一种自行理顺分配关系的能力。这就需要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的有机结合,并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类似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下的财富分配格局。所谓君子爱财,其所表征的是对利益动机和市场经济逻辑的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sup>[21]82</sup>、“‘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21]103</sup>那样,无视利益动机和市场规律的驱动,财富的有效持续发展就容易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而所谓“取之有道”,则正是对应上述“爱财”之前提,时刻提醒我们在实现财富复归于广大人民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

从上述认知逻辑出发,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指向“共富”的财富分配机制,应当是这样一种基本格局:

首先,必须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之道。应该说,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管其具体境况如何,按劳分配都是其在财富分配中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界的拨乱反正,最初就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及为按劳分配正名开始的。当然,就当下而言,我们在理解和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按劳分配时,必须正确把握好以下几大原则:

第一,按劳分配中分配给人们的财富,根据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创造。换句话说,就按劳分配对应的市场经济而言,由于其处于初次分配阶段,因此必须关注效率问题,讨论那些非经人力作用就已经存在的天然财富的分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部分财富早已自然存在,与是否需要激励来促成财富的增长这一问题根本无涉。所以,按劳分配关注的重点,应该是那些被人们创造出来且在市场交换中得到价值实现的财富如何来分配。因为只有将按劳分配原则理解为按创造出来的财富来进行分配的原则,财富的活力才会不竭长流。

第二,被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并非全部都拿来分配,其在涉及个人所得时,应该有一个权重问题。可以说,分配权重的合理配置是财富分配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鉴于财富价值的社会属性,一定要通过这一设置,确实起到在保证个人所得的增加一定是以社会财富的更大增加或大多数人的普遍受益为基本前提。因此,为富者个人应拿小头,财富创造的大头应由社会大多数人通过初次分配或二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获取。在此前提下,只要权重配置合理,那么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鼓励人们去发财致富。在这其中,为富者该拿多少就拿多少,再来议论收入过高或者采取类似“限薪”的举措,则已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正是当初邓小平强调的“共同富裕绝不等于也不可能完全是平均,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sup>[22]287</sup>,因此必须要充分理解先富“带”后富的本意所在。

其次,必须继续探索按资分配财富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sup>[1]36</sup>,以此来千方百计地增加居民收入。如上所述,技术、管理等作为生产要素如用复杂劳动来加以衡量,其收益是可以纳入按劳分配范畴的。但是,劳动的内涵再丰富、外延再扩大,也不能将资本纳入其中,乃至马克思将资本称之为“特殊的以太”<sup>[18]48</sup>。

而通过对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参与财富创造的内在机理的分析,我们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由  $G$  变成  $\Delta G$  的描述中所揭示的资本增值的奥秘那样:简单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但与之恰恰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却是“为卖而买”(更确切地说是为贵卖而买)，“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诚然, $G$  变成了  $G + \Delta G$ , 100 镑变成了 100 镑 + 10 镑。……如果把这 110 镑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末 110 镑和 100 镑一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表现,从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有限度的。”<sup>[10]177-178</sup>

由此,通过  $G$  变成  $G + \Delta G$  的无止境运动,我们至少可以对资本的增值奥秘有两点认识:

第一,资本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资本增值过程中“为卖而买”的过程,直接揭示了资本的目的是作为交换价值的  $\Delta G$ 。于是,相比劳动直接创造财富、是价值的源泉而言,资本在财富创造中出现的  $\Delta G$  现象,则意味着资本是一种为获取交换价值、更通俗地讲就是为获取货币的增加、通过钱来生钱的财富运动。这也是资本区别于劳动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这一过程固然能说明资本与财富创造的密切关联性,但也说明了资本并非与生产直接勾连,其所获取的增值财富也并非是实打实的财富,而是货币形态的财富。因此,  $\Delta G$  是否就真的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则是个伴随着资本增值全过程而需要始终打问号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各种资产形态存在的资本通过股票、债券等形式来使自己成为索取未来剩余价值的“权利证书”<sup>[23]575</sup> 这一资本化、证券化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对上述这些证券化资产的不断的“再证券化”,从而使资本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层面而只是表现为纯粹围绕未来的预期而出现数值层面上的上下波动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第二,资本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由  $G$  变成  $G + \Delta G$  的无止境运动意味着,资本的增值是指数型的。因此,虽然资本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如果  $\Delta G$  是实打实的而不是虚的,那么这一逻辑就能使财富的增加总体上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特征,而社会生产一经有了资本这个要素发挥作用,就确实能够促进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并在总体上由算术级向几何级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在于,“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



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sup>[10]697</sup>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认为就当下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按资分配而言,其除了要继续坚持被分配的对象必须是因资本参与其中且在市场交换中得到价值实现的那部分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且为富者个人应拿小头、财富创造的大头应由社会大多数人通过初次分配或二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获取的基本原则外,还要特别注意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已断无可能独善其身、自得其所,因此,必须全面防范并有效控制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进而通过有效的举措力争将那种理性狡计充斥其间、道德风险不言而喻的虚拟财富增长过程中形成的有毒泡沫挤压出去。这也是我们在财富分配中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

最后,结合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原则的基本阐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缩小收入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并达到共同富裕,就绝不能单靠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原则而单纯地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来实现,而是必须要靠初次分配后的二次分配和再分配。而其具体原则,就是要在通过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关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来“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1]20</sup>的基础上,在切实使得市场与政府的有效互动中有效地规范好以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指向的初次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借助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兼顾效率”但“更加注重公平”<sup>[1]36</sup>的精神指导下,真正将整个社会在除去初次分配之外所有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朝着“实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不断复归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从而使整个社会在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过程中,真正使广大中国人民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应有之意。

####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张雄,鲁品越. 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11·财富哲学专辑)[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8] 王家范. 中国历史通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9]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鲁品越. 中国现代化悖论与和谐社会建构[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1):19-26.
- [1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5] 参见邱卫东. 列宁晚年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再认知[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5):26-29.
- [16]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7] 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 未来的社会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0] 参见鲁品越. 现代生产力结构与我国所有制结构[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7):36-41.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23]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ABSTRACTS

---

### **Culture, Nihilism Discours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the German and the Russian Enlightenment to China**

LIU Sen-lin(5)

The forced late-developed modernized countries suspected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which is the doubt of its cultural outcome of nihilism. This suspicion not only nullifi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late modernized countries, but also brought about an unavoidable nihilism outcome. Germany and Russia had experienced such a challenge one after another. Germany therewith highlighted its particularity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rejected the middle-class culture, and even neglected the politics under the banner of culture and art. It caused a painful lesson. Russia expressed its dissatisfaction and negation to the Western capitalism with exaggerated literature and radical political movements. There was a painful lesson as well.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day, great importance must be attached to the cultural issues so as to prevent excessive secularization of society. While increasing our soft power, we must learn a lesson from Germany to guard against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o prevent the antagonism of traditions, particularity to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so that we might finally commit to an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fter a full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of modern achievements.

###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and Its Critique**

TAN Jie LI Xian-min(13)

As a part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denies the legitimacy of state and elucidates its own political philosophy. However,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claims that we should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legitimacy of stat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resistance level of the behavior of the state, and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is the sole purpose of anarchism. There ar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debates between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and other fact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the Way to Chinese Dream**

DENG Bin Peng Wei-min(19)

Common prosperity, a central topic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designed by DENG Xiaoping, has been put into the political agenda and practice by later leaders as a magnificent dream. Over th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ommon prosperit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process rather than a result in light of Chinese dream. It is an urgent and difficult question as for how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ontemporary and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futur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reasons and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reventing polarization, promoting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turn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to a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one, and making the fruits of reform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are the central mis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ome Thinking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Light of Capital Rationality**

QIU Wei-dong(25)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also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Bu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he present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sing a variety of the basic reality of ownership capital wealth in production put us in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inner tension of the capital and Common Prosperity.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the core measure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apital critique. In this sense,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apital, effectively guide the harness of capital, and perfectly match the wealth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alloc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lan an overall road to the socialist Common Prospe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N Chong-de(43)

The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s based on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The emphasis on teachers' moralit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outlook of teachers' mor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need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velopment, with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teacher's morality in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for teachers. The teachers' mor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contains rich contents, an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eacher's love of the occupation and devotion to the job, their love for the students, their meticulous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and their intended behaviors as an example for the students.

### **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EN Shi-jian WANG Tao(52)

Since Julian proposed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themes. Further developed by Cousin, Mann and Barnard,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has formed an important tradition in this field of studies. There i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education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on the theoretical building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referenc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 **Dual Function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Lower Class**

GUO Yong-yu ZHOU Chun-yan(6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posi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ive in nature. On the one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more strongly in a just world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time and effort to their long-term goals, which would in turn contribute to the moving up of lower-class individuals. On the other h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with strong endorsemen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ight justify the status quo by their increased perception of justice, which in the long run would legitimate hierarchy inequality. To sum up, for lower clas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ays a dual function.

### **Nonviolence Psychology: History, Model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Wei PAN Wei HUANG Jia-yu(77)

Nonviolence is an action designed to exert influence on others so as to reach a goal without direct injury to those working against the achievement of a goal. It is not until the rise of peace psychology tha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nonviolence sees some practical and adequate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models postulated by peace psychologis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violence, including Kool'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nonviolence, Teixeira's holistic theory of nonviolence, and Brenes' model of peaceful selfhood. In future research, the study of nonviole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mprove its indigenization of measurement, encourage th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conduct more empirical studies into social life, and emphasize the eco-culture criticism.